

论中国民族学上的范式转型

作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陈瑞文

[摘要] 民族学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民族学的范式，在最初的引进时期，是单一的古典进化论。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派和北派并存：在南方转为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北方则取采功能论。解放初期，南方民族学学派被取消；北派则转变为苏联模式的民族学学派。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转型，北派民族学研究都以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进化论作为指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学中断，1978 年得以恢复，旧的研究范式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新的研究范式至今还在摸索当中。本文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探讨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民族学上的范式转型。

[关键词] 范式；古典进化论；苏联模式；文化史；功能论

在《天演论》出版后几年，在当时国内学科发展刚起步的条件下，古典进化论自然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唯一范式。民族、种族等概念也在这个时候被传入中国。也在这个时候，学者们翻译了国外有关古典进化论的民族学的一些著作，例如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由马君武翻译；日本学者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由萨端翻译；林纾和魏易则翻译了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的《民种学》，并于 1903 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有些学者也自己著书，利用进化论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如刘师培 1903 年所著的《中国民族志》，1906 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等等。

以古典进化论为范式的萌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过于简单地接受进化论，也极少有实地调查，所以民族学在当时难于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这种思想使中国民族学得以建立，为以后中国学者对民族学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民族学规范模式的构建与转型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中国民族学家们努力构建学科的规范模式。当时的中国民族学的萌芽阶段，只有翻译国外民族学的著作，才能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提供最初的理论来源。于是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国民族学界翻译了许多西方民族学著作。包括当时世界民族学上著名的功能学派、传播学派、人文区位学、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作，都有涉及。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形成了华东、华南和华北三个研究区域，各个区域有自己的特征。华东地区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体现出较多的古典进化论和德奥传播论派的特征；华南地区的民族调查和研究，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学派特征；华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体现出强烈的功能论色彩。在翻译、著书、调查和研究工作中，不同地区学者的观点不一致。在同一个地区，显示出广泛的共同特征。当时，“中国历史学派”在中国民族学界影响较大。历史学派强调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为解决中华民族历史的问题，对历史文献材料，运用世界当时先进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解释。虽然某些人对于文献资料的摘录过多甚至过



于繁琐，也有人对外国民族学理论没有很好的理解，造成一些学术观点模糊，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历史学派”在当时的影响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必不可少的，这与当时的政治因素有关，中国当时实力相对西方处于落后的水平，有必要“以史为镜”，对国内的民族及其历史进行研究探索。历史学派的学者们把历史学与民族学联系在一起，认为研究民族学，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同样研究历史，也要用民族学的方法。这时期“中国历史学派”的作品主要有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文化》和《中国边疆民族》、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略论》、芮逸夫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和《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等。

中国功能学派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中国功能学派与“中国历史学派”两者各有特点。前者在北方，后者在南方，“南北学派”的称呼由此而来。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他们都热衷于用功能论的观点来对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吴文藻认为功能学派是当时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他认为，简单地利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简单地用历史文献资料来填充西方民族学理论，都是不够的。他希望能把功能理论引入中国，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学科。为了更好地让国人认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请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来燕京大学讲学。拉德克利夫·布朗来中国的讲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学界的学者，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在燕京大学听讲的学者和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功能主义的理论。

李安宅曾翻译了马凌诺夫斯基的两篇基于对原始民族的调查的论文——《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和《原始心理的神话》(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合编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于1936年出版。马凌诺夫斯基的这两篇论文，用功能论的观点来分析巫术、宗教和神话等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例如，他认为巫术在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巫术具有满足个人心理和生理需要的功能。他认为在人们无法满足生活的欲求而感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巫术可以给人主观上的恢复心理和生理平衡的价值。相信巫术的人，使用巫术之后，会增强信心。对于社会来说，巫术有一种把社会组织起来的力量。整个部落的生产活动，都依靠巫术整合起来。

费孝通曾在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导师是功能理论的另外一个创始人——马凌诺夫斯基，他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功能主义理论的方法。“早在二战的1938年，当费孝通作为非西方学者迈进人类学学科中时，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超越了上述人类学研究的‘原始’和‘野蛮’传统时空界限，将研究的田野扩展到农业文明社会文化，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并于1939年正式出版，成为开创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将该书视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利用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进行调查，超越了传统的只对“原始”和“野蛮”社区的调查，在世界民族学和社会学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林耀华《金翼》一书，也体现出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在前言中，林先生写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功能学派此时最主要的缺陷，是忽视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历史学派的一些做法，认为历史学派过多摘录文献资料。而功能学派却犯了相反方向的毛病，缺乏对有关史料的摘录和研究，这是因为当时对英美功能学派各方面都持肯定的态度，而不能客观地对其不足进行批判。



关于解放后的中国民族学，王建民等学者认为，自1950年起，“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五个时期。这三个大的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后；五个时期则将前后两个阶段各分为两个时期，中间的一个阶段是一个时期。也就是说，1950年年初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前，是民族学在中国得到恢复与发展的时期；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是民族学艰难发展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民族学学术发展遭受严重灾难的时期；1978年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方略的确定，是民族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和再发展的时期；1992年至今，是民族学在中国走向开放和学术转型的时期。”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民族学，受到50年代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的影响。当时政府把民国时代的高等院校系统，统一改造成了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该院系的调整中，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南和华东的民族学、人类学人员全部转入当地的历史学，或者调到华北，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机构被取消；华北不全部取消，但是研究机构只能保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把人员调进去该机构，同时也加入了少数南方学者。原来在华北热衷于功能理论范式的学者，不得不采用原来在华南和华东地区学者所流行的古典进化论，也就是文化史的研究范式。

与此相对，台湾学者却在1965年左右，把学术范式由原来的文化史研究范式，转向英美流行的功能学派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也是台湾地区唯一一次确定的学术范式转型。1965年以前，先是受日本统治政策的影响；1949年，大部分大陆历史学派的学者随国民政府赴台，并领导了光复后台湾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同时也受西方民族学的影响，形成台湾民族学的文化史研究范式。在1965年前后发生了范式转型，一种以英美功能学派理论为主的研究范式在台湾人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胡鸿保等学者认为：“构成转轨标志的是两种趋向：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工作重点从台湾原住民转向当地汉人社会；二是民族学研究所越来越强调人类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际融合，即转向行为科学研究。转轨的结果是人们的关注焦点从文化史的构建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

在中国大陆院系调整以后，南派民族学解体，而北派民族学发生了范式转型。原来华东、华南和华北三个研究区域，只剩下华北一个区域，并且转变成为以古典进化论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指南，各学术活动都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在此过程中，过去以欧美研究传统为主的民族学，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观点，被强制统一接受古典进化论和苏联模式的民族学理论。

二、前苏联模式对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影响

这个时期，苏联模式对中国民族学界影响涉及到各个方面，苏联模式民族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特点，从一开始就以服务苏联的国家建设为己任。有学者认为，它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原始社会史研究、关于民族的界定与识别、经济文化类型。

在原始社会研究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苏联民族学普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展的顺序依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古典进化论是相一致的。在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之后，以往热衷于英美功能论的林耀华写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一文，可见当时老学者也受形势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因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以苏联模式为模范，就离不开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要把原始社会的面目反映出来，来证明该学说的正确性。苏联民族学和中国民族学的这个研究范式的采用，是有其政治色彩的。

在民族定义与识别方面，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对中国民族学研究影响深远。从1950年起，政府组织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调查。该调查学术上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参照斯大林



对民族的定义。该调查借鉴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而进行。由于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强调学习苏联，在民族识别上也不能例外，所以出现在理论和原则上主张照搬苏联模式。

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切博克萨罗夫与林耀华受苏联模式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影响，合著了长篇论文《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并于1961年发表。该书的观点被当时中国民族学学者们广泛接受，因为此书提供了分析世界各民族共同体的分类框架，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苏联的模式，只能接受，拒绝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民族学的停顿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完全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学几乎没有发展，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学在这个时期解体了。美国学者顾定国(Gregory E·Guldin)在他所著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的第十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人类学学科的解体——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召开，中国民族学才得到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机会。

三、中国民族学的重建与成就

1979年4月至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1980年10月，民族学界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1981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正式成立人类学系。该系设置民族学（后来为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学制为四年，成为祖国大陆最早复建的人类学系。几年内厦门大学和一批民族学院，相继建立人类学或民族学部门或系，这些都是民族学的重建的标志。

80年代的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但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较之前灵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但不再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以前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也敢于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占主导地位的古典进化论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下降，不能称之为当时的研究范式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族学在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民族学界掀起了自20世纪初后的另一次翻译国外学术理论著作的高潮。“这一期间出版的主要是现代经典或近年海外影响重大的专著，计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忧郁的热带》、《图腾制度》，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马尔库斯等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和《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费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人类学名著译丛’包括马凌诺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布朗的《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和莫斯的《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华夏出版社的‘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内则有马凌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也在这时被翻译介绍给了国内读者。”

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大陆的政策向经济转移得越来越突出，同时民族学不能直接带动经济，中国民族学虽然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却处于边缘学科的尴尬地位。不过，中国民族学界这个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们，偏向现代文化研究。在很多领域与其他学术交叉发展，在国内引进和发展了医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方面，民族学的研究以文化为主线，加强了对汉人社区的研究，这是以前学术界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时期研究方向和理论上的多元化，导致很难形成统一的或者被广泛接受的研究理论，新理论的建设也相当困难。这个时期酝酿着学术范式的转型，但是要促成这个转型，确立新的学术范式，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应该在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寻找并建立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科范式，也就是民族学的中国化。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民族学研究范式从1965年后的功能学派理论，逐



渐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跟中国大陆一样，如今台湾地区新的学术范式还没有确立。台湾地区的民族学，同样面临着重新寻找新的学术范式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 [3]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 [4]何国强,20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轨迹:理解文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
- [5]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 [6]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香港,三联书店,1990。
- [7][美]顾定国著,胡鸿保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8]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